

古人的劝诫观

□ 石志刚

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对上司、同僚、下属、朋友会提出非常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直言、或委婉、或讽刺、或含蓄，旨在说明厉害，提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这就形成了古人的劝诫观：鞭辟入里、以情动人、言旨据理。

东汉名臣李固年少好学，能够撰写一手好文章，能够积极推荐有才华的人入仕。李固在推荐优秀人才入仕的过程中，写书信，引经据，抓心理，释疑惑，鼓其心，让入仕之人抛去顾虑、大胆出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在选人用人方面有着许多制度设计，其中察举、征辟、认子制度是当时比较盛行的选官方式。汉代察举是由下而上推荐人才。征辟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其中包括皇帝亲自出面征聘，选聘名望很高且品学兼优之士。认子制度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

当时的名士黄琼集这三种选官方式于一身，被朝廷赏识。他的见识能力符合察举要求，他的多学好思符合征辟要求，他出身显赫门第又符合认子制度。因此，黄琼很早就被朝廷关注，皇帝多次征召他入仕，都被他拒绝。当时李固得知此事，因久闻黄琼之名，就给黄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看法。在信中，李固引经据典，先说历史上的伯夷、柳下惠，虽然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楷模，但是在判断时代发展潮流、为民做事的态度上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李固引用扬雄的《法言》中对此二人的评价“不夷不惠，可否之间”来告诫黄琼，在遵循时代发展规律和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成为贤良之人最为珍视的内容。洞悉黄琼有志报效国家，但是碍于各种顾虑和纷扰，李固以尧时的巢父、许由为例进行阐释：如果您黄琼想学习巢父、许由的行为，当然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但李固行文至此话锋一转，面对“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时代和国家急需一批有“辅政济民”之

心之才的人，像您黄琼这样志向又有能力的人出仕不正是恰逢其时吗？李固又通过列举所谓社会名士被朝廷重用，结果名不副实，为名士这个称谓披上了黑色的纱巾，继而提出希望，希望黄琼作为名士，能够还名士以清白之名：“愿先生弘此远谏。”黄琼收到李固这封信后，打消了顾虑，立即动身入京，拜官封相，成为一名大臣。

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受到燕昭王的礼遇和重用。乐毅率领部队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直逼齐国都城临淄，恰逢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其人心胸狭窄、多猜善疑，受到齐国田单反间计的影响，撤销了乐毅的军权，并派骑劫为将，然骑劫连败于齐国。此时，燕惠王担心逃到赵国的乐毅趁机率领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向乐毅致信，批评乐毅忘恩负义，希望乐毅返回燕国。乐毅针对燕昭王“使人数之以罪”，通过对先王燕昭王任用贤良的魄力之事进行追忆，入情入理地阐释自己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都在于报效先王的缘故。而燕惠王的猜疑、指责、非议在燕昭王的信任、欣赏、肯定的对比下，失色太多，这就是乐毅选择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一。乐毅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二在于他能够明白，历史上国君对大臣有猜忌时，大臣很少有幸免的。乐毅在信中告诉燕惠王，从情感上讲，“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从理性上讲，“离毁辱之诽谤，陨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为了维护燕昭王尊重贤良所形成的良好口碑，更感恩特定历史时期君臣之遇，这是乐毅所期待的，也是乐毅一直以来行事风格的前提。如果能够了解乐毅的行事风格，必然不会担心乐毅会率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再次印证了燕惠王目光短浅、缺乏政治眼光。乐毅的这封信，既露忠义之心，又显感遇之情，做到了情理交融，读来令人动容。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写下了《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阉阉之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道理令人深思。



两宋纸币滥发与防范的博弈

□ 方宝璋

限制纸币发行量

有关纸币发行量与价值的关系，南宋初年，四川转运使赵开就已发现，“楮多则轻”。宋宁宗时期，大臣袁燮指出，“盖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到了南宋景定年间，宋理宗在其诏书中，进一步把物价与纸币发行量、币值这三者的关系作了精炼明晰的表述：“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换句话说，楮币发行多了，就会引起单位币值下降，单位币值下降，就会引起物价上涨。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人们不懂得，在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限度以内，兑换纸币发行的多寡不会影响它的票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只有在纸币的发行超过这个限度时，纸票的价值才会取决于流通的纸票数量，即此时才会出现“多则贱”的情况。不考虑金属货币流通必要量，简单地肯定纸币的多寡决定它的贵贱，这不符合纸币流通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南宋各种纸币的发行大都很快就超过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因此，当时人观察到的楮多导致楮贱，继而导致物贵的规律又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针对这种滥发纸币引起币值下降物价上涨的情况，较多的人还是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回笼。如袁燮主张应经常采取间断性的回笼政策，借此来调节单位币值，控制物价。他说：“其（楮币）贱耶，亟从而收之，何忧其不贵？既贵矣，日月浸久，价将复贱，则又收之。非常收也，贱而后收也。”“贱而后收”其实是亡羊补牢式的救济措施，并不能算作完善的纸币管理手段。完善的纸币管理方式应该是首先注意纸币的投放量，使币值保持稳定，然后再通过回笼调节，掌握主动权。如宋孝宗稳定纸币价值的主要措施不是“贱而后收”，而是着眼于限制发行量。宋孝宗清醒地认识到“会子之数不宜多”。只要纸币投放量不太大，即使会子有时偏多，采取各种措施回笼也较容易收效。宋理宗景定年间，丞相贾似道上奏言：“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更明确地认识到解决楮币发行弊端最迫切的措施是停止印制楮币，换言之，即减少或限制发行量。



交子



会子的反刻雕版

纸币回笼

北宋纸币发行之初，是比较严格遵循定额发行的。自仁宗天圣初年开始，每界交子的发行额控制在126万贯以内，并且留有准备金。两宋纸币的超限额发行从徽宗朝开始，除孝宗、光宗朝还算正常外，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其趋势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一切限制纸币发行量的主张和思想都成为空谈。在此情况下，要控制纸币在流通领域的数量，只能靠多种手段进行回笼，以缓解纸币泛滥、物价飞涨的危机。

一种方式是以金属货币、实物、茶盐钞引等回笼纸币。要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最可靠的办法是兑现。如南宋中期，袁燮提出以铜钱收兑纸币，以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他认为国家以金属货币收回纸币，是宋孝宗时回笼纸币成功的唯一经验。南宋前期，人们经常利用金属货币来回收、称提纸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南宋时期纸币的发行量日趋增多，铜钱的数量则因钱荒的严重而急剧减少，因此，利用金属货币回笼纸币已无异于杯水车薪。这时，一些其他回笼纸币的措施就应运而生。如这一时期“重楮”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杨

冠卿，根据四川发行交子的成功经验，提出措施来挽救会子之弊。他建议通过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都接受会子来回笼纸币。这一措施受到人们的欢迎，对缓解纸币发行量过多带来的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一种方式是以出卖度牒和官告回收纸币。度牒是官府发给僧侣证明身份的文件，可以使持有者免交赋税或服劳役。官告是古代授官的凭证，也称告身。宋制规定官告视官职大小，用各色绫纸，盛以锦袋。在南宋，较早产生以出卖度牒、官告回笼会子的思路是在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诏先次给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以收买会子。宋宁宗开禧北伐后，三界会子并行，会子发行量空前增加，会价大跌。嘉定三年（1210年）春，受命主持称提事务的刑部尚书曾焕提出了一个兑收会子的初步方案，其总共九项“名件”中，除卖官田、卖乳香套两件共约280多万贯以外，其余七项共2200多万贯是通过卖官告、度牒等得来的。这说明当时出卖官告、度牒已成为政府回笼纸币的一个重要手段。

还有一种方式是以旧会打折兑换新会来回笼纸币。北宋末年，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其币值不断下降。



《史记》中的三种用人模式

□ 杨 波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整部书以写人为中心，本纪、世家、列传共计112篇，其中处处体现了举贤任能、尊敬贤能的用人思想。现举出《史记》中的齐桓公、楚庄王、燕昭王的用人事例，作为典型模式，加以介绍。

齐桓公“化敌为友”

齐桓公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公元前685年至643年在位，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与杰出的政治家管仲的辅佐分不开。但是先前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政敌，差一点致齐桓公于死地。管仲曾是齐桓公的竞争对手公子纠的心腹，在一次偷袭中，他射中了齐桓公的腰带，险些要了齐桓公的命。

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偃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为了能让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

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楚庄王“惩恶扬善”

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公元前613年至59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楚庄王称霸中原，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的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楚庄王初即位，大权旁落，为了自保，以待时机，庄王佯装沉迷酒色，同时暗中观察，对人才之善恶贤愚，了然于胸。

《史记·楚世家》记载：“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

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楚庄王听政伊始，便能杀数百恶人，进数百善人，显示了他对善恶贤愚的明察和励精图治、大展宏图

的魄力。“惩恶扬善”的用人模式，更多地出现在朝代更替的时候。新的政权为了稳住政局，巩固新生政权，大多要对前一朝进行清算，特别是对那些民愤大、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理，以树立新政权的威信。与此同时，也进升一些民望好、品行端正的清正之士担任官职，以充实新生政权的队伍。

燕昭王“引进人才”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国君，公元前311年至279年在位，在位32年。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最弱，屡次败于齐国。燕昭王即位之初，便发誓报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燕昭王对他的手下郭隗说：“齐国趁着我的国家动乱袭击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国力少，不足以报复齐国。但如果能得到贤能的人才一同治理国家，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心愿。先生见到这样的人才，我愿意亲身侍奉他。”郭隗说：“大王如果一定要招揽人才，就先从我开始吧。那些比我贤能的人，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您的。”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于

原先新旧纸币除扣除“纸墨费”“靡费钱”后一比一兑换的做法难以维持。徽宗时期，规定旧币必须打折兑换新币，“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嘉定初年，正值会子换界，政府试图通过换界使会价得到较大提升，规定嘉定四年（1211年）新发行的第十四会子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二贯，即以一新兑二旧的比例兑收旧会。这一办法使会子的流通量在短时间内大为减少，对会价的回升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的社会效果来看，以打折的旧会兑换新会，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豪夺民间的财富，把纸币贬值的损失转嫁给老百姓承担，因而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第四种是扩大纸币流通区域以“稀释”流通量。辛弃疾在分析会子贬值的原因时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会子贬值是因为发行太多，而流通区域仅限于军队驻地和京城附近州县，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没有流通，即使会子在有限的地域内积而不泄，形成量多贬值。于是，他主张通过扩大流通区域，达到“稀释”会子在某一区域的流通量，即在某种意义上实际已减少了会子的数量，从而提高会子的价值。辛弃疾的这一想法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从总体来说，宋廷回笼纸币的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对纸币超限量发行引起的币值下降、物价上涨问题起了缓解的作用，有利于货币价值的稳定和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但是，宋代纸币的超限量发行不属于发行中预计不准确而造成的，而是属于为解决财政危机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其纸币投放量大大多于回笼量，大大多于流通领域所需要的货币量，因此所有回笼手段最后都回天无力。



是昭王为魏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迫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六岁。”燕昭王招揽各国才俊，乐毅来自魏国，邹衍来自齐国，剧辛来自赵国，各国有用人才纷纷来到燕国，在短短28年间，燕国便由弱变强，大败齐军，陷齐国七十余城，足见“引进人才”的威力。

“引进人才”的用人模式，在历朝历代都得到很好的应用。这种开放地包容地不拘一格地吸纳全国各地人才，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为一个政权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能够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强盛的态势。

治国之要，用人为本。用人的模式还有许多，但是要想国家强盛，关键是不拘一格用人才。西汉刘向《说苑·谈丛》有言：“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天下人才可谓多矣，关键是能不能用。只有不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真正地欣赏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天下忠士才能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